

青末了

随笔

星期三
2013.8.14

齐鲁晚报

B06-B08



台北：莫言与村上比较

□林少华

【文化杂谈】

台湾淡江大学找我去用日语讲讲村上。我说讲村上可以，但要用汉语或“国语”讲。这倒不是我刻意凸显主体性，主要是因为台湾毕竟是讲中国话的地方。再说我的日语终究不如汉语那样出口成章，何必扬短避长呢！同胞到底容易沟通，当即表示OK。我又提出不光讲村上，要莫言、村上一起讲，比较二者的同与不同。对方连声叫好，鼓励说大家肯定感兴趣。

是啊，哪能不感兴趣呢！一个实际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连续几年是诺奖有力竞争者。我猜想，时下能从学术角度比较这两位世界级当代东亚作家的人，除了我恐怕不大好找。在一般人眼里，这两人差别太大了。一个是满脑袋玉米花粉的“土老帽”，一个是满身名牌休闲装的都市“小资”。换个比喻，一个是挥舞光闪闪的镰刀光膀子割红高粱的壮汉，一个是斜举着鸡尾酒杯眼望窗外细雨的绅士。一句话，简直是“城乡差别”的标本。这固然不错，我也完全承认，但这终究是表层，而若深挖下去，就不难发现两人的根子有不少是连在一起的。就作品而言，例如善恶中间地带说、民间视角与边缘人立场、富有东方神秘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及作为共同文学创作“偶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就性格而言，两人都比较内向，不事张扬，即使成名之后，一个情愿至在家中檐廊逗猫玩也不外出忽悠，一个宁可回家包饺子也不愿意出镜亮相等等。

这么着，我就两人的同与不同、似与不似一口气说了许多。兴之所至，最后竟偏离主题，祝愿莫言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伟大的长篇小说——借用莫言自己的话，“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

要像鬣狗一样成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同时祝愿村上春树早日写出不亚于他所倾心的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复调小说——以村上的话说，“里面有某种猥琐、某种滑稽、某种深刻，有无法一语定论的混沌状况，同时有构成背景的世界观，如此纷纭杂陈的相同要素统统挤在一起。”

今生今世，作为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那样的小说了。惟其如此，我才祝愿别人、祝福别人，祝福伟大的小说，祝福诺贝尔文学奖。

如此演讲完毕，主持人——东吴大学L教授夸奖说“极其精湛”。休息时两位女学者特意告诉我，刚才的演讲让她们加深了对莫言文学的理解。还劝我在台湾多待一段时间，多讲讲莫言和村上。态度之真诚，言语之热切，险些让我以为自己就是村上 and 莫言。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繁体字版村上作品译者、台湾翻译家赖明珠女士主动领我逛台北。看样子，她早已把昨天圆桌会议上两人就村上文体和翻译风格打嘴仗的场景忘得一干二净，热情地带我看了台湾大学、中正纪念堂、中山纪念堂、“总统府”，看了台北仅有两株的“加罗林鱼木”中花期正盛的一株，看了“109”，最后一站是颇有名气的诚品书店。店门口有个一人多高的红色繁体“閱”的立体雕塑。书店，书，阅。表里如一，名符其实，好！于是我站在“閱”的后面，把脑门夹在顶端两扇门之间，嬉皮笑脸，由赖明珠女士“咔嚓”两声按下相机快门。

也是因为昨天满脑袋莫言、村上，转身进门我就留意找莫

言，以为莫言的书像在大陆那样迎门码堆或摆在书架抢眼位置，岂料左顾右盼了好一阵子，也没找见莫言。也许我没找对地方，反正莫言的书一本也没有，就好像这里发生了“文革”似的被扫荡一空——我想决不会是被读者扫荡一空，而一定是书店压根儿没上架。至于莫言逆风飞扬的简约发式下的憨厚笑容，更是了无踪影。相反，村上君手托下巴的思索者形象赫然入目，漫说中文译本，就连日文原著都比比皆是，甚至哈佛大学杰·鲁宾教授翻译的英文版《挪威的森林》，也以电影版渡边和直子(尽管直子怎么看都不如她头发上的雪花漂亮)头碰头的形象做封面在那里码成一摞：《Norwegian Wood》。不仅如此，新出的专门介绍村上的日文原版杂志书也立在那里：“春树大学开学了！”翻开一看，标语牌似的方格里写道：“村上春树正该得诺贝尔奖！快得，快快！”得得！我略一沉吟，决定买一本《挪》的英译本，比较研究一下哈佛教授是不是比我这个非哈佛教授翻译得契合原文风格也好嘛！又顺手拿了一本村上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交款时赖明珠女士不失时机地拈出她的会员卡，于是我以九折买了《挪》的英文版：250元。新作恕不折扣，799元，合计1049元台币，折合人民币约210元。顺便说一句，台湾教授月工资为台币10万挂零。

假如莫言的书摆在这里，那么定价会是多少呢？想到这里，我对赖明珠女士抱怨道：这不公平，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的书而只有诺奖候补者村上的书？岂非薄内厚外？她笑笑，笑得极其完美。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公共长假与串休

□陈心想

【公共话题】

重要节日长假应不应该放、该如何放，曾为社会各方讨论。我们不妨先看看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做法，苏联曾经有过取消公共假期使用串休或者说轮休的试验。

1929年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为了最大程度地增加生产，让机器永不停转，制定了“红色日历”。在这个日历上，五天为一周，而不是七天一周，每天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串休，其他人做工。全国没有公休假期，全部是串休，也可以说是轮休。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家人朋友想聚会，必须这些要聚会的人都在同一天串休，协调起来很困难。结果大约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能够协调出都合适的串休时间。这个时间安排制度只存在两年便宣告结束。很大的原因在于，工人们太恨它了。连当时苏联官方《真理报》都发出了抱怨的声音：“如果我们的妻子在工厂里，孩子在学校里，没有人来访……那么，我们在家又能干什么呢？如果你必须独自在家，就等于没有假期。”

造成这样的情况，其根源在于时间不是单个分割存在的，而是社会性网络物品。时间不仅仅是数量的多少，几天，几个小时、几分、几秒，而且还有网络性质。社会活动大多数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多人的事情，即使是情人的幽会，也至少是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都可以在同时共享时间。如果你要看父母，他们在工作，你串休了，他们也要在相同的时间串休，才能达到团聚的条件。像春

节、中秋节及西方的圣诞节和感恩节等这类节日，都比较讲求家人的团聚，如果有人因为工作不能到场，就会降低团聚的欢乐成分。这时候，公假，而且为了赶远程的长假就必要了。

说时间的网络性质，可以拿最常见的电话做个比方。在上世纪初期，拥有电话的人很少，有电话的价值就低；当电话普及后，有电话的价值就高了。因为别人都没有电话，你有电话派不上用场；大家都有了，你可以通过电话与大家联系。现在的电子邮件也是这个道理。回到公假来看，因为大家都可以利用这个公共假期探亲访友、进行社会交往，这样对个人而言，休假的价值才体现出来。

有人会问，一个人休假，在家歇着也不错。对有些人来说，没有人玩，自个儿可能玩得挺好。但人是群体性动物，没有人玩，比如找个陪聊的也找不到，会很快乐、很郁闷。克里斯托巴·扬格及其同事最近的研究发现，失业人员在周末时的快乐与就业人员没有差别，但是在工作日就明显下降。原因就在于工作日人家都在上班，失业人员找不到人一起活动；周末的时候，失业人员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喝点酒，吃个烧烤，自然就快乐了。也因为时间的社会网络性，真正的闲暇放松，还是要有别人陪的。研究精神健康的学者们研究时通常会用情感支持网来分析朋友多少、家人关系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从快乐角度来说，个人的快乐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人

的影响。周围家人朋友都是快乐的，你也更快乐。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时间饥荒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大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上班的人，要照顾家庭，要陪孩子，协调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是许多学者研究的热门领域。如果我们了解了时间的网络性，就知道时间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日程的协调搭配问题。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曾经试验过的串休制度，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其无效性。公假是必需的。当然，即使是公假，也还是要有人在服务的，不然人口流动都有问题，没有出租车，没有公交，没有火车，没有飞机，都放假了，整个交通都停止了。所以，公假也不是绝对的。虽然公假会有些损失，尤其是长公假，比如有些大学生不愿意去旅游，也不回家，就在学校呆着，但是课时因长假而少了，学习的机会少了。另一个代价就是公假时的交通拥堵问题。但是只用串休。像苏联曾经的“红色日历”，代价更大。最好的办法就是两者之间取一个“黄金分割值”。保持一定的公共长假，比如“五一”和春节，一年两次，搭配适当的带薪串休。这样，既保证了大家远程亲友团聚的机会，也给大家一定的灵活机动的休假自由。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